

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 70 年

赵联飞

提要: 1953 年以来, 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经历了停滞期(1953 - 1978 年)、恢复重建期(1979 - 1985 年)、实践提高期(1986 - 1999 年) 和快速发展期(2000 - 2019 年)。经过近 70 年的发展, 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方法论、研究方法和具体的研究技术方面均取得了明显的进步。70 年间的发展历程在整体上呈现出知识系统化、实践规范化和取向本土化三个趋势。

关键词: 社会学 研究方法 70 年

一、发展历程

1949 年以来, 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社会学学科在 1953 年被取消, 直到 1979 年才恢复重建, 社会学研究方法作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 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历程的影响。从 1953 年之后的历程来看, 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一是 1953 年至 1978 年的停滞期, 二是 1979 年至 1985 年的恢复重建期, 三是 1986 年至 1999 年的实践提高期, 四是 2000 年至 2019 年的快速发展期。

(一) 停滞期(1953 - 1978 年)

社会学研究方法与社会调查紧密关联, 因此, 社会调查的开展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观察社会学研究方法发展情况的途径。尽管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在 1953 年之后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况, 但社会学的一些分支学科知识仍然以各种曲折的方式得以延续。费孝通曾说, “我到了民族学院以后, 就进行了一系列少数民族的调查, 说这些调查是社会调查未始不可, 称之为民族社会学也说得过去”(费孝通, 1982)。他进一步指出, “如果把社会学看成是我们对社会现象的科学认识, 把我们的眼光扩大一些,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项工作解放前后都没有停止过, 社会调查是党的优秀传统, 《毛泽东选集》第一篇就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它是对中国社会的科学认识”(费孝通,

1982)。但他也同时指出,这样开展的调查“如果说是社会学的延续,这个社会学已经不是解放前的那一套社会学了”(费孝通,1982)。从这些论述来看,停滞期尽管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调查,但这些调查多是在了解社会现象、作为政府行政工作内容的意义上开展的,而且这些调查也并未完全按照规范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来开展。

(二) 恢复重建期(1979-1985年)

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1994)。根据这一决定,社会学于1979年开始恢复重建。

1. 社会学方法人才队伍的建设

在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社会学专业人才出现了严重的断层。1980-1984年期间,为了培养方法教学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湖北省社会学学会以及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等单位在北京、武汉、天津、上海等地陆续开办了5期讲习班,许多学员后来成为社会学方法研究及教学的骨干和基础力量(戴建中,1989)。当时香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李沛良、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以及美国著名社会统计专家布莱洛克(Hubert M. Blalock)均被邀请到中国讲授相关社会学实证研究方法。此外,1980-1985年期间,上海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先后设立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这为培养具有社会学研究方法专业素养的学生构筑了基础。

2. 社会学研究方法教材的建设

在恢复重建之初,社会学方法教材几乎是一片空白。为此,部分研究人员加紧编写了有关社会研究和社会调查的教材。在这期间,先后出版的教材有张世文、张文贤编写的《社会调查概要》(1984)、仇立平编写的《社会调查纲要》(1985)等。

在出版专门的教科书之外,在社会学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也成为普及和推广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根据对知网收录文献的不完全统计,在1979-1985年期间,有关专业期刊共发表有关社会学调查方法的期刊文章近300篇,^①其中较有影响的包括费孝通的《社会学调查要

^① 在“中国知网”上以“社会调查”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并从结果中选取“基础研究(社科)”类别。

发展》(1983)、沈关宝、仇立平的《社会调查知识问答(四)》(1983)等。

专题研讨会也成为交流和学习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在1979-1985年期间,不少研讨会以社会调查为主题,扩大了社会调查的影响。例如,湖北省社会学学会在1981年主持召开了社会调查方法问题讨论会,会议对社会调查方法的现代化特征、如何实现调查方法的现代化以及社会学常用调查方法进行了讨论(许云,1982)。

3. 社会学调查研究活动的展开

风笑天(1989)曾对我国社会学恢复以来的社会调查分析进行回顾和分析。分析表明,社会调查活动一方面在恢复重建期逐渐增多,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还相对朴素,科学性和规范性都存在不足。在恢复重建期的社会调查活动中,费孝通主持的江苏小城镇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该项研究结合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进程,使用区位学理论和方法,对社会经济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和综合研究,在社会学研究方法和调查方法上具有较大突破,被认为是当时最重要的调查之一(戴建中,1989)。

(三) 实践提高期(1986-1999年)

费孝通在《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中明确提出“自从1979年重建社会学以来已经有六个年头了。至此,初建的第一阶段可以告一结束,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费孝通,1986)。1986年11月,“全国首届社会调查方法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标志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在随后的10多年里面,社会学研究方法不断在实践中提高,发展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

1. 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教材逐步丰富

在1986年至1999年期间,国内陆续出版了多部社会研究方法的教材和译著,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袁方的《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1990)、卢淑华编著的《社会统计学》(1989)、风笑天的《透视社会的艺术——社会调查中的问卷设计》(1990)、郭志刚的《社会调查研究的量化方法》(1989)、《社会统计分析方法》(1999)、法国社会学家布东的《社会学方法》(1987)、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论》(1988)、《自杀论:社会学研究》(1996)、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1999)等。

2. 逐渐改变了恢复重建期偏重社会调查实用技术的情况

学界对研究方法的讨论开始从调查研究技术延伸到整个社会学研

究方法,并自觉对既有研究进行检讨。这一转变以 1992 年在天津举办的“全国社会学方法学术讨论会”为标志。这次会议之后,不少学者对社会学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和反思。

3. 系统开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训练,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整体水平明显提高

1995 年、1997 年和 1999 年,共有三期“社会学方法高级讲习班”(“福特班”)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京大学举行。这三期高级讲习班吸引了众多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教学和科研人员参加。同时,对外学术交流开始增多,到国外访问、学习的人员增多,还有部分在海外求学归来的研究人员也将规范的社会学方法训练体系传播到国内。

4. 大型调查项目开始实施

1988 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CHIP)开始实施;1989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开始实施。这些大型调查项目的实施客观上推动了研究方法、调查技术以及分析技术的进步。

此外,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和以 SPSS 为代表的桌面统计软件的流行,计算机技术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贯穿了从资料收集、资料处理到统计分析等研究活动的全过程,推动了定量分析的普及。

(四) 快速发展期(2000-2019 年)

过去的 20 年中,社会学研究方法规范程度快速提高,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讨论更加深入。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发展呈现出如下显著特征。

1. 社会学研究方法随着学科建设力度的加强而得到快速发展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社会学学科的博士点不断增加,截至 2010 年,全国具有社会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达到 16 个;到 2019 年,这一数量增至 19 个。社会学研究方法作为“六腑”的分支学科之一,随着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得到快速发展。

2. 教材体系和培训体系进一步丰富,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学习提供了支持

2004 年 7 月以来,重庆大学出版社组织翻译了大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著作,这些图书目前已经成为从事社会学研究方法学习和研究

的重要参考书目。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三期社会学讲习班和90年代中后期的“福特班”之后,2000年以来再次出现了多个社会学方法培训班(课程),北京大学—密歇根大学定量实验室举办的暑期课程班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3. 全国性大型调查数量增多,推动了定量实证研究的发展

自2003年开始,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先后设立了多个全国性的调查项目,这些项目中影响较大的包括“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3年开始)、“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 2005年开始)、“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08年开始)、“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09年开始)、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2年开始)。这些大型调查多为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调查主题较为丰富,基于这些调查数据的研究多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提升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整体水平。

4. 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开始崛起

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拉夫特里(Raftery, 2001)所言的第三代统计方法开始得到应用。也就是说,随着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展,文本、图像、声音等对象进入社会统计学的分析范畴,推动了社会学定量分析的进一步发展。二是以女性社会学研究方法、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为代表的各种定性研究方法日益为人们所重视,使得研究主体和客体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模糊化的倾向。三是随着互联网全方位地渗透至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进程,数据驱动的研究开始崭露头角(潘林, 2015),基于互联网的实验性质的研究也开始得到介绍和研究(林寒、罗教讲, 2016),计算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快速崛起(罗玮、罗教讲, 2015)。这些都预示着未来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必定要将互联网这一因素纳入考量。

二、主流观点和学术热点

(一) 方法论层面的讨论

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学者对社会学方法论的讨论既涉及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社会学本土化等根本性的问题,也涉及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规范讨论,还有的涉及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和基本伦理

问题。

早期的方法论讨论主要集中在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关系。戴建中(1989)在回顾1989-1999年的社会学方法发展时曾指出,中国社会学界在广义的方法论上具有高度的共识,“都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论和历史唯物论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方面,张小山(1991)认为,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对立突出表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而这又根源于两派在本体论上的不同认识,从而在社会学中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研究范式,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研究要求下,它们都能产生出富有价值的成果。

张杨(2007,2009)与尹海洁、庞文(2009)针对“证伪在社会科学中是否可能”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张杨(2007)认为,波普尔所提出的证伪主义除了受到自然科学哲学的批评外,更不适合基于概率性因果关系的社会科学。尹海洁、庞文(2009)则认为,张文所提出的社会科学不能被证伪是对波普尔证伪理论的误解。他们强调,“证伪、可证伪性、证伪主义三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不能加以混淆”。对这一商榷,张杨(2009)进行了回应,强调“从逻辑的角度看,科学定律既不可能被可获得的证据完全确立,也不可能被有限量证据全盘证伪”,统计检验并不等于证伪。

王宁(2002)对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对立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双方的对立是双向度的。在“整体”观上,个体主义坚持化约主义的立场,而整体主义则秉持反化约主义的立场;对立的结果是个体主义犯了“消亡论”错误,而整体主义则陷入了“物象化”的陷阱。在“个体”观上,个体主义采取了反社会决定论的立场,而整体主义则强调了外部社会决定论的立场;其结果导致“个人”在个体主义那里“社会化不足”,而在整体主义那里则“社会化过度”。文章认为,超越二者对立的方向之一是解决“社会结构”和“主体行动”的发生学根源和再生产条件。

谢宇(2008)指出,“困惑邓肯的最基本的问题——总体异质性——仍是当今量化社会学所面临的重大难题”,“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结果,至少我们无法在方法论上解决它”,“我们应该像邓肯那样做一位智者,即致力于深化我们对社会科学重要的实质性题目的实证理解,而不是致力于获得惊天动地的结论”。

在定量方法研究者对自身的“武器”提出批判的同时,定性方法的研究者也在不断深化对定性研究方法的认识,并致力于将其扩展至更大的效力范围。卢晖临和李雪(2007)分析了个案研究中存在的四种基本方式,指出“分析性概括才是个案研究的生命力所在”,“个案研究法的魅力不在于……样本选择的代表性或典型性,而在于其辅助理论建构的力量”。杨善华(2007)分析了阿格妮丝·赫勒的日常生活哲学以及现象社会学家舒茨所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指出以个人生活史为切入点,挖掘和解释制度安排中的“盲点”是捕捉各种“现象意义的悖论之处”的重要方法。吴肃然等(2018)则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学科重建以来,以本科基础课程为代表的“研究方法教育”便一直带有鲜明的美国定量实证主义取向,它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话语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面貌,锚定了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理论研究在学科知识体系中各自的地位和困境。因此,重视教材编写,调整课程设置,促进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共同繁荣,应该成为未来社会学研究方法发展的着力点。

2000年5月,费孝通在一次报告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他说,“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当我们对某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往往会借用西方的社会理论。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反思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我们是否把握了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我们是否明白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到底有多少差距,以及我们是否恰当地运用了这些理论”(费孝通,2000)。在2003-2006年期间,中国的学者们开始讨论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问题,并进一步加强了对转型社会的关注。例如,周晓虹(2010)讨论了中国问题研究中的“冲击—回应”以及“国家—社会”两种分析路径,应星(2006)对叙事这一研究方式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特别意义进行了讨论,李强(2000)提出中国人心理“二重性”,等等。渠敬东(2016)进一步提出,源自西方的实证主义方法有其自身的人心和文化根源,当下的社会科学家好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概念话语,更丰富、准确、深入地理解今日现实状况及其历史经验,而走出这一步则是中国社会学自立的一个前提。

女性主义是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刘军(2002)认为女性主义方法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改变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张宛丽(2003)认为女性主义社会学挑战了原有的社会学和

社会科学知识,开辟了与以往的知识体系所不同的另一种认识视角及领域。吴小英(2002)认为,女性主义的兴起具有两个背景,一是长期以来社会学内部形成的对女性或性别问题的普遍忽视,另一个则是社会学包罗万象的统一理论的式微和反实证主义潮流的兴起。吴小英(2003)进一步提出,并不存在所谓独特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只存在独特的女性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

与女性主义相呼应的另一方法论层面的主张则是“干预社会学”的提出。沈原(2006)讨论了强干预和弱干预两种取向。他认为,基于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提出的行动社会学主张,“社会学干预”或许是解决转型社会学视域下的诸种社会问题的有效措施。不过,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过程,社会学干预方法必须在原则和技术上都有所改进。嫁接“解放社会学”的诸原则,形成“强”“弱”两种干预手段,可能构成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黄盈盈和潘绥铭(2009)从方法论的层面强调社会调查必须在研究伦理的框架之内进行。他们认为,“调查过程其实就是这两个主体之间的人际互动,而调查的结果则是双方共同建构出来的。我们把这种认识归纳为主体建构视角”。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应从方法论角度认识研究伦理的贯彻对于提高调查质量的积极作用,“任何社会调查都要贯彻研究伦理,这是一种刚性的要求”。

(二) 研究方法的进展

在关于研究方法本体的认识方面,风笑天(1997)对国内外社会学者关于社会调查方法、社会研究方法及相关的概念、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社会调查方法与社会研究方法是两个密切联系但有着明显差别的概念,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类型或方式。

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规范性方面,风笑天(2003)回顾了1980年以来141项研究报告中对方法的报告情况,认为90年代末期以来,研究者在报告中对调查方法的介绍已有了十分明显的改观。

夏传玲(2007)认为,借助于计算机的定性研究有助于“发现纷繁的定性材料中的隐含模式”,以及“管理这些范畴、概念以及概念和原始资料的联系”,有助于“更清晰地界定概念”,“发展概念之间的关系”。但使用定性分析软件也有着“定性资料失去语境”、隔离“数据和分析”以及容易盲从于计算机等潜在问题。沙莲香等人(2007)则讨论

了基于 SARS 期间对民众社会心理跟踪调查的计算机模拟结果,指出“运用计算机模拟更深的意义是通过其对现实数据的拟合与实证数据的验证,增进对系统的理解,尤其是针对复杂系统的分析,计算机模拟具有特别的优势”。

谢宇(2006)曾提出社会研究中的三个原理:变异性原理、社会分组原理和社会情景原理。高勇(2009)和梁玉成(2007)可以看作是利用情景性原理进行研究的典型代表。高勇(2009)采用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也称为 UNDIFF 模型)考察了职业流动。梁玉成(2007)则提出,地位获得和代内职业流动中分别存在着现代化和市场化所导致的世代效应、时期效应和年龄效应,并通过 AGP 模型分解现代化转型和市场化转型的影响。

陈云松、范晓光(2010)指出,基于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困扰,因而难以做出恰当的因果推断。大量现有的社会学定量分析虽以解释为己任,但实际上要么停留在描述统计阶段,要么得出错误的因果结论。他们以社会互动研究为例,讨论了遗漏偏误、自选择偏误、样本选择偏误和联立性偏误等四种主要的内生性问题来源,并介绍了克服内生性问题的一系列模型识别方法,提出了通过提高调查数据信息量以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

(三) 具体技术方面的进展

在测量方面,沈崇麟(1990)对误差概念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并对调查研究中各个阶段的误差产生机制进行了分析。张小天(1994)认为,可以将所有的变量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学研究者无法可靠测出的变量,另一类是可以可靠测量的变量。操作化就是为属于前一变量群的某个变量在后一变量群中找到对应的变量(即指标),以便能够用操作测量方法可靠地测量这个变量。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张小天(1994)的关于操作化的思路实际上是潜变量模型的另一种表述。

在分析方面,吴愈晓(2010)采用时间史模型分析方法,探讨了1978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居民的精英职业地位获得是如何受到“旧式精英”(新中国成立前政治和经济精英)和“新式精英”(新中国成立后再分配经济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家庭背景影响;陈光金(2010)应用夏普里值分解技术分析了多种因素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王存同(2010)应用零膨胀模型分析了中国人工流产影响因

素;田丰(2010)采用布朗分解方法对城市工人和农民工收入的差异进行了讨论;黄荣贵和桂勇(2009)则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研究了在线业主论坛对集体抗争事件发生的影响。陈云松(2013)使用工具变量分析技术,对中国城镇居民的日常互联网使用与群体性上访、示威、集会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在资料收集和分析技术方面,赵延东和琼·培德森(Jon Pedersen)(2007)讨论了受访者驱动抽样(respondent drive sampling, RDS)方法在调查“隐藏人口”方面的应用。张丽萍(2009)分析了抽样调查入户抽样阶段各种统计口径人口的年龄结构,提出对现有 Kish 表抽样过程的改进建议。风笑天(2007a, 2007b)与郝大海(2007)则讨论了对样本规模的认识。

三、回顾与展望

从社会学研究方法 70 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总体上呈现三个特征,即知识系统化、实践规范化和取向本土化。从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四十年历史来看,前两个特征呈现日益强化的态势,而本土化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 1952 年之前的本土化进程的接续和重继,同时也是对社会学中国化这一学科整体性倡导的回应。

费孝通(1983)曾经指出,“实际上,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知识信息社会已经有了各种联系,而且,这些联系使我们原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想象力已经面临着许多挑战,就像我们在理解当今社会的复杂性时碰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在克服这些困难时越来越感到必须要加强学习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是试图更好地把握时代变化的大趋势,并希望走向时代发展前沿的,那么我们肯定是有必要经常检查自己所做的研究能否贴切地反映现实社会”。费孝通在三十多年前讲的这番话实际上对当今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发展方向仍然有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

社会学研究方法与时代的联系尽管不像理论和其他分支学科那么紧密,但也并非超然于时代。如果我们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以及话语体系三个角度来观察社会学研究方法 70 年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实际上也是和时代休戚相关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停

滞期内社会调查是如何以隐秘的方式延续,可以观察到女性主义方法论是如何在总体主义式微和女权运动盛行的年代被引入,可以看到全国性调查如何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产生,还可以看到研究方法教学的学科体系是如何在高等教育快速扩张的背景下逐步建立,更可以看到贯穿在社会学研究发展历史中的本土化思考。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未来发展方向应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紧密结合,向着规范化、系统化和本土化的发展目标不断前行。

参考文献:

- 布东,1987,《社会学方法》,黄建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陈光金,2010,《市场抑或非市场:中国收入不平等成因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 陈云松、范晓光,2010,《社会学定量分析中的内生性问题:测估社会互动的因果效应研究综述》,《社会》第4期。
- 陈云松,2013,《互联网使用是否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社会》第5期。
- 戴建中,1989,《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十年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邓小平,199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
- 迪尔凯姆 埃米尔,1988,《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1996,《自杀论:社会学研究》,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费孝通,1982,《关于社会学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
- ,1983,《社会学调查要发展》,《社会》第3期。
- ,1986,《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社会》第2期。
- ,2000,《我们要对时代变化作出积极有效的反映》,《社会》第7期。
- 风笑天,1989,《我国社会学恢复以来的社会调查分析》,《社会学研究》第4期。
- ,1990,《透视社会的艺术——社会调查中的问卷设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1995,《近五年社会学方法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第1期。
- ,1997,《社会调查方法还是社会研究方法?——社会学方法问题探讨之一》,《社会学研究》第2期。
- ,2003,《结果呈现与方法运用——141项调查研究的解析》,《社会学研究》第2期。
- ,2007a,《高回收率更好吗?——对调查回收率的另一种认识》,《社会学研究》第3期。
- ,2007b,《再谈样本规模和调查回收率——对〈应答率的意义及其他〉一文的回应》,《社会学研究》第6期。
- 高勇,2009,《社会樊篱的流动——对结构变迁背景下代际流动的考察》,《社会学研究》第6期。
- 郭志刚,1989,《社会调查研究的量化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999,《社会统计分析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郝大海,2007,《应答率的意义及其他——对中国“高”调查回收率的另一种解读》,《社会学研究》第6期。

- 黄荣贵、桂勇 2009,《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 黄盈盈、潘绥铭 2009,《中国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方法论层次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
- 李强 2000,《“心理二重区域”与中国的问卷调查》,《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 林寒、罗教讲 2016,《互联网社会实验研究:社会学研究的变革与进步——基于国外已有成果的分析》,《科学与社会》第 6 期。
- 梁玉成 2007,《现代化转型与市场转型混合效应的分解——市场转型研究的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模型》,《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 刘军 2002,《女性主义方法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第 1 期。
- 卢晖临、李雪 2007,《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 1 期。
- 卢淑华 1989,《社会统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罗玮、罗教讲 2015,《新计算社会学: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 潘林 2015,《数据驱动的城市尺度人类移动性研究》,天津大学博士论文。
- 仇立平 1985,《社会调查方法纲要》,上海:上海大学文学院。
- 渠敬东 2016,《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文化纵横》第 2 期。
- 沙莲香、刘颖、王卫东、陈禹 2007,《社会心理现象计算机模拟及其方法论意义》,《社会学研究》第 6 期。
- 沈崇麟 1990,《社会研究中的量度误差问题》,《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 沈关宝、仇立平 1983,《社会调查方法问答(四)》,《社会》第 1 期。
- 沈原 2006,《“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 田丰 2010,《城市工人与农民工的收入差距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 王存同 2010,《零膨胀模型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的应用——以中国人工流产影响因素的分析为例》,《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 王宁 2002,《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对立的新思考——社会研究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 韦伯·马克斯 1999,《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华夏出版社。
- 吴肃然、闫誉腾、宋春晖 2018,《反思定性研究的困境——基于研究方法教育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第 4 期。
- 吴小英 2002,《“他者”的经验和价值——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尝试》,《中国社会科学》第 6 期。
- 2003,《当知识遭遇性别——女性主义方法论之争》,《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 吴愈晓 2010,《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 夏传玲 2007,《计算机辅助的定性分析方法》,《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 谢宇 2006,《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8,《奥迪斯·邓肯的学术成就:社会科学中用于定量推理的人口学方法》,《社会》第 3 期。

- 许云,1982,《社会调查方法问题讨论综述》,《社会》第2期。
- 杨善华 2007,《关注“常态”生活的意义——家庭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初探》,《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
- 尹海洁、庞文 2009,《证伪: 社会科学研究的可能与必然兼与张杨商榷》,《社会》第4期。
- 应星 2006,《略论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3期。
- 袁方,1990,《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赵延东、Jon Pedersen 2007,《受访者推动抽样: 研究隐藏人口的方法与实践》,《社会》第2期。
- 张丽萍 2009,《应用 Kish 表入户抽样被访者年龄结构扭曲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张世文、张文贤,1984,《社会调查概要》,重庆: 重庆出版社。
- 张宛丽 2003,《女性主义社会学方法论探析》,《浙江学刊》第1期。
- 张小山,1991,《实证主义社会学面临挑战》,《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张小天,1994,《论操作化》,《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张杨 2007,《证伪在社会科学中可能吗》,《社会学研究》第3期。
- 2009,《再论证伪主义的问题对尹海洁、庞文商榷的答复》,《社会》第4期。
- 周晓虹 2010,《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社会学研究》第2期。
- Raftery A E. 2001, "Statistics in Sociology, 1950 - 2000: A Selective Review."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31(1) .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社会调查与数据处理中心
责任编辑: 梅 笑

MARXIST SOCIOLOGY

Commemo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view of Social Theory Studies in China (1949 – 2019)

..... *Zhao Liwei & Chen Tao* 1

Abstract: The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theory research in mainland Chinese academia in the last 70 years , especially after the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ciology as a discipline in China. It summarizes and reviews important research within the field. Systematic translation of major works in Western and Chinese social theory , specialized studies in social theory and the attempt to construct “Chinese social theory” constitute main fields of social theory research in this period , during which both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serious problems co-exist. In particular , much work remains ahead for constructing “Chinese social theor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Past 70 Years *Zhao Lianfei* 14

Abstract: Since 1953 ,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has experienced periods of stagnation (1953 – 1979) ,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1980 – 1985) , improvement in practice (1986 – 1999) and rapid development (2000 – 2019) . After almost 70 years of development , Chinese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have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methodology , research methods and specific research techniques. The developmental course in the past 70 years shows three trends of systematization in knowledge , standardization in practice and localization in orientation.